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海盜邦到耕作村：國家主權下香港的海岸與農地敘述

From Pirate Nation to Farming Village: Hong Kong's Maritime and Agrarian Narratives under the State Sovereignty

doi:10.6752/JCS.201609_(23).0007

文化研究, (23),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016

作者/Author：羅貴祥(Kwai-Cheung Lo)

頁數/Page：127-14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07](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From Pirate Nation to Farming Village :
Hong Kong's Maritime and Agrarian Narratives under the
State Sovereignty

Kwai-Cheung Lo

從海盜邦到耕作村：
國家主權下香港的海岸與農地敘述

羅貴祥

羅貴祥，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主任。
電子信箱： : kwaiclo@hkbu.edu.hk

投稿日期：2015年01月09日。接受刊登日期：2015年12月09日。

摘要

本文探討香港對本身社會的一些想像，可以被理解為與國家論述交涉甚至對抗的聲音。本文集中討論香港過去的海盜敘述與現在的農地敘述。稱這些為「敘述」，因為它們只能向外在環境投射一些想像，只是些模糊信念，不是統一連貫的意識形態系統。這些故事敘述的內容自相矛盾、犯駁，因為它們往往是集體經驗與想法的混合體，而不是深思熟慮的創作。在張保仔的傳奇裡，海盜組織是50年代香港難民社會的縮影。海盜故事敘述最吸引香港人的，是海盜從沒有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左右逢源以取得自主的求生狀態，被香港的敘述吸納，投射為在中西之間擔任買辦的殖民地故事。二十一世紀面對不斷壯大的中國主權國勢力，香港出現了另一種尚在起步的農地敘述。它不僅是關於農田耕作的，更與整體的香港土地使用有關。抗衡中國政府的霸權，香港農地故事敘述可以被視為一種本地充權、試圖重建社群的欲望。這種敘述鼓吹復興農業，並嵌入了不少當下世界的流行理念，例如生態運動、有機耕作、食物自主與安全、環保意識、文化保育等等。當代世界已經愈來愈受國家政府的控制、管治，逃離的空間似乎變得不可能，但這些敘述即使只是一種幻想，也可以讓本已被遺忘抹掉的東西若隱若現，造就看似不可能的改變。

關鍵詞：香港、國家、敘述、海盜、農地

Abstract

Whil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a society has been overwhelmingly framed by the nation-state, there has been a different mode of depicting the past as well as the present in the fugitive society of Hong Kong. This essay examines how the romantic narrative of pirates in the past and the agrarian narrative at the present have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many Hong Kong people. Narrative in this context is understood as something yet to establish itself as a coherent ideological subjectivization but constitutes certain imaginary relations to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r functions as a socially symbolic praxis. The content of such narrative could be conflicting in itself, revealing it is more a product of diverse 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thinking than any consistent project. The essay analyzes how the maritime piracy on the southern Chinese coasts has been appropriated in the Hong Kong regional narrative to parallel Hong Kong collective imaginary as well as real situations. The pirate society was assumed as the epitome of Hong Kong refugee society of the 1950s, projecting freedom from the state control or any sovereign authority. The essay also looks at an inchoate agrarian narrative about Hong Kong facing up the looming power of the Chinese sovereign state after the 1997 handover. Such agrarian alternative seeks to secure Hong Kong community as an autonomous place by advocating the revival of farming activities in order to voice the dissent from the increasingly centralized rule by embedding sentiment for the locality within a series of modern global discourses, such as ecology movements, organic farming, food sovereignty, environmentalism, and preservation of heritage. Although these non-state narratives may be criticized as phantasy, they may effect as potential events that allow something to be reproduced under oblivion.

Keywords: Hong Kong, Nation-state, Narrative, Pirate, Agriculture

長久以來，香港是個逃亡者（或難民）社會，它開埠初的主要人口是從主權國家控制領域內逃出來的人。他們的第二、第三代傾向視香港為落地生根的地方，儘管這些下一代同樣害怕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統治，而香港作為高度資本主義社會強調速度與流動，似乎也沒有甚麼「根」可言。

在現代世界，關於一個人或一個社會的歷史敘述，都很難逃出主權國家的描述框架。我們亦不容易找到，任何一個社會或群體的歷史可以不屬於民族國家的例子。然而，香港對本身過去的書寫以至想像，確曾企圖逃離國家論述的範圍，嘗試與它分道揚鑣，各走各路，特別是當國家論述發揮著掩蓋性的主導與壟斷作用的時候。換言之，香港這個華人社會的歷史呈現，雖然會不斷受主導論述（即所謂「正史」）左右，但也並非完全沒有其他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敘述，以不同的方式為它勾畫輪廓面貌。而這些帶點曖昧無稜的香港敘述，或可以被視為與國家論述交涉甚至對抗的聲音。

當然這些不服從者的聲音非常微弱，甚至接近滅音，不容易被社會聽到，亦難以產生重大影響。它們只能被看作是對國家權威的（無聲）抗議、隱蔽式的反叛。而這些抗命的敘述都是在接受了既成秩序、識趣地向當前現實妥協的大前題之下發生的。所以，它們可能只是以幻想、白日夢的形式出現。亦因此更確定了本身的從屬、次等地位，象徵性的抵抗更突顯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譬如在我們將會討論的香港海盜敘述中，最彰顯的內容總是講述國家機構如何掃平海盜禍患，重建和平社會，儘管海盜才是這些敘述中的主人翁。對海盜的遐思，可以理解為對汪洋大海這個遼闊空間的幻想，即使這個流動空間的自由象徵性逐漸被封鎖，想像力卻又轉移投放到狹小匱乏但自然茁壯的農地上去，延續著脫逃政權控制的空間解放意象。

我稱這些為「敘述」(narrative)，因為它們只能向外在環境投射一些想像的聯繫，或者只構成某些模糊信念，卻未能發展成一套統一連貫的意識形態系統。這些故事敘述的內容有時自相矛盾、互不配合，兼且犯駁，因為它們往往是集體經驗與想法的混合體，而多不是深思熟慮的個人創作。這些敘述對被既有秩序掣肘的人來說，是一種想像的自由，即使他們未必自覺自己陶醉於這種集體創造。換句話說，這些故事敘述其實受歷史與個人生活經驗變更影響，並非是沒有時間性的物體（所以它不完全是夢）。透過想像的創作力，這些敘述某程度上提供了對現實的認知，但同時在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描畫出自己的歷史位置。清醒意識不一定是對抗幻象的武器，沉著冷靜也不可能驅散壓逼性的日常秩序，因此這些敘述總是處於啓迪與朦朧之間，似是而非。

或許可以這樣說，九七前香港的被殖民者沒有主觀渴望社會政治的改變，因為社會穩定才是他們的最終欲求。九七後香港的被統治者即使渴望社會政治改變，但力量懸殊，亦未必能夠產生較大的效果。2014年爆發的「雨傘運動」以公民抗命的實際行動，占據香港部分區域的主要街道長達七十多天，爭取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行政長官普選，卻依然無功而還。直接的抗爭行動，在後九七的香港暫時無法打開任何政治缺口，我們更有必要觀察間接、潛伏的民間敘述，從而尋找其他可能。不過，這些另類的故事敘述，究竟是否會被建制化，變為無殺傷力的象徵性抗議，甚至強化既有秩序，或許仍是個有爭議性的問題。本文嘗試探討這些敘述所能提供的有限可能性與策略，反思（象徵性）抗爭的平凡面貌，為隱蔽性反抗賦予新意義，以及尋找它們造反的潛能。政治學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曾經說過：「隱蔽謄本（可以被詮釋為）實際抗爭的條件，而不是它的替代」（1990: 191）。這些敘述起碼可以讓群眾投射一種社會自主的感覺，某程度上挑戰著國家的強大論述，同時在象徵性地對抗國家下，幫助人們找到一些（政治的）自主性。恣意地，這些敘述也可以理解為，人的角色既可順應又可改變歷史狀況。

在一個比較壓抑性的環境裡，這些非國家敘述並不完全只限於經濟上的下層階級。經濟上的階級地位，在這種歷史環境下，不完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關係不會機械地主宰下層的人群是否或如何反抗，因為階級政治往往會因應歷史環境而變改。這些「微不足道」的另類——如果不是反抗性的——敘述，可以當作香港群眾發揮他們的政治力的一種方法；當然，另一方面，這些敘述又被國家、政府允許存在——如果不是被吸納，藉以中和它不可輕視的對抗性。

一、海盜敘述與張保仔

對英國殖民統治下的不少香港人而言，海盜張保仔的傳奇曾經十分牽引他們的想像力。張保仔原名張保，香港人為他的名字加上親暱的「仔」字，顯示人們相當喜歡這個海盜。關於他的浪漫化、傳奇化故事，多年來與香港難民社會的敘述不時混合在一起。老一輩的香港人都津津樂道名盜張保仔的故事，隨時可以說出香港何處是張保仔的巢穴、營寨、軍械庫、藏寶洞、避難所等遺蹟。

曾在中國東南沿岸活躍的海盜，被香港的地方敘述挪用，反射了香港的

集體想像甚至真實情況。在這些敘述裡，海盜邦派被形容為擁有強大武裝力量，甚至具政治影響力的一個團伙，與朝廷勢力相互競爭，操控航海路線、有能力徵收稅項、監管領土等。海盜普遍被視為南方人，這一點對同是以南方人為主的香港人口特別有認同親切感。海盜被塑造為周旋於中國朝廷與西方帝國勢力之間，雖然有時會被收編招降，成為某一方的僱傭兵，但對中國皇帝或西方勢力都不是真心誠意地效忠。國家政府與不法勢力都想利用海盜，海盜卻心知肚明自己不過是出賣武力勞力找尋生計的一群。

十六、七世紀時，儘管明代與清代政府都禁止海外貿易，海盜活動及非法的海外通商卻仍然蓬勃發展，與日本、東南亞以至歐洲商人的貿易禁之不絕。海盜與走私是商業活動的組成部分。合法的貿易在增長，非法的貿易亦同時衍生發展，兩者其實關係密切。海盜與走私的黑市經濟也帶來正面的經濟成果，既促進了地區貿易，亦造就了機會，讓貧苦大眾也能參與商貿活動。地下市場在南方海岸興起，為海盜與走私客的船隊提供後勤補給的服務。海盜與走私客是開拓新商機的先鋒，他們的船隊敢於冒險，到達一般商旅不易或不願到達的地方及航線。海盜打劫所得的物品，以低價在地下市場售賣，讓普羅大眾也可以享用這些物品，同時亦拓展了批發網絡。由於不少人需依靠海盜延伸的商業活動維生，而逐漸成了在現代初期南中國沿岸重要的自足經濟體。

香港的經濟發展，從歷史源頭來說，某程度上也有海盜與走私的成分。不少華商不理政府禁令，透過香港口岸與外國商人建立貿易網絡。香港殖民地成立初期，英國非常依靠香港人的合作，逐步建立基本設施。

海盜有能力逃避政府的控制，自行集結力量，獨霸一方，與中國政府及外國勢力構成微妙的地緣政治關係。國家政府(state)在這裡被理解為是一個威壓、控制的機構，與人民的關係並非是一種自願的社會協約。事實上民間社會的普遍組織都不是政府模式的，不會層層下壓，且規模偏細，容許較大的彈性與自由度。詹姆斯·斯科特的《不受管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2009)研究南亞的人民如何逃避高壓政府的課稅、徵兵與勞役政策，逃往高山建立他們的去中心化社會。香港的難民其實也因相類似的理由而離開中國，流徙到這個沿海的殖民地。地理阻隔可以限制政府的管治權力：高山峻嶺與汪洋大海無疑能暫時阻礙政權的擴張，但工業現代化卻又助長了威壓政府的統治，可以向不同空間膨脹。然而國家的邊緣仍然是不少人的逃難所，邊界始終難以密不透風，國家主權在邊境地區不容易絕對又恆久地行使。

逃離政府操控的人民，跑到邊疆建立他們的逃亡者或難民社會。相對於國家政府管治的社會，這些難民社群的結構較細小，中央權力亦較微弱、短暫；社群身分相對沒有強制性，人們是否參與這個社會，純基於個人利益考慮。正因為要逃避政府操控，這些社群的組織結構都傾向較小型、較少等級、亦比較平等，目的就是不要變為國家政府。較細小的社群比較不會向群眾進行國家式的高壓政策，由逃亡者或難民組成的社會也不大可能有國家式的組織結構與行為。在張保仔的傳奇裡，海盜組織有點兒是50年代香港難民社會的縮影，海盜邦不是一個主權國家，既沒有領土疆界，又沒有嚴密的社會政治形式。沒有人當它是永久的家。這種觀點普遍在50年代香港的難民一代存在，即使英國殖民政府也沒有興趣要把香港建構為一個長治久安的地方。二次大戰之後，英國曾經想過放棄香港，不單因為香港無險可守，無法抵禦中國的共產勢力入侵，更因為大量大陸難民湧入，對一個沒落的殖民帝國，構成嚴重的負擔。

海盜故事敘述最吸引香港人的地方，是海盜從沒有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海盜進行搶掠、勒索、殘殺，只是為了錢，不是為政治原則或為政權效忠，即使與不同政府周旋，但對任何政權都不表忠誠，是典型的兩頭蛇。他們沒有建立國家政府的野心欲望，他們不過是賊匪而不是權力欲大的政府。即使海盜邦有時變得龐大，可以與政府匹敵，在某些歷史時刻扮演著不輕的政治角色，國家政府會不公開地企圖收買、籠絡海盜邦，直至把他們收復為止，而海盜邦也知道自己難以持久，不可能長期維持；雖然在一些歷史時段，海盜確曾發展宏大，成為影子帝國，在國家邊垂掠奪與壟斷了貿易。正因為這些力量，海盜故事激發了失去大陸家園、逃避政府操控的香港難民一代的幻想。

1684年當清政府控制臺灣之後，開始再容許海外通商，不少商人亦因此轉而支持政府打擊海盜，沿岸的有勢力家族也漸漸歸順政府，大大減弱了海盜活動的後盾支持。中國海盜的黃金時代是十六至十九世紀初期，二十世紀中期卻反而燃起了香港人對海盜的熱切興趣，實在有其他的因素存在。

50年代香港媒體流傳過不少有關張保仔的故事，但都是片段形式的。最早期較全面地講述張保仔事跡的，要算是葉靈鳳(1905-1975)以「葉林豐」之名刊行的《張保仔的傳說與真相》(1971)一書。此書在1971年出版，收集了作者過去二十年對張保仔的考據文章。葉靈鳳依據的資料主要是地方志及一些西方論著，他強調寫作的目的，是要粉碎有關這個著名海盜的沒有根據的傳說。不過，在葉靈鳳的敘述裡，張保仔的神話沒有被搗破，反而更被神化。張保仔與香港的神祕關係亦沒有消除。雖然他否定了張保仔的多個巢穴設在香港島的傳

言，但在沒有很強的證據下，葉靈鳳認為張保仔真正的巢穴其實在大嶼山。¹

在葉靈鳳筆下，張保仔儘管不是個劫富濟貧的俠盜羅賓漢人物，但也是個有一定正義感、略帶階級鬥爭意識的人。他率領二千多艘船、近二萬群眾，中國政府與西方列強都視他為心腹大患。葉靈鳳在書裡情節生動地描寫張保仔如何多次擊敗來剿他的滿清水師，又如何被葡萄牙人的新式艦械聯合滿清水師圍困在大嶼山赤瀝角八天，還是能突圍而去。《張保仔的傳說與真相》一書確定了不少傳說為真相，例如張保仔的海盜邦怎樣輕易打敗清兵、進擊沿岸村落、扮成清兵來擾亂民團等事蹟。

葉靈鳳的書裡說，張保仔是被逼成為海盜的，跟一般的浪漫化說法，以為海盜都是逃避壓逼與社會不公而選擇下海為寇頗不相同。據葉靈鳳的描述，張保仔本是廣東漁民，十五歲時被大海盜鄭一所擄，自此成為了他的手下。鄭一來自鼎鼎大名的海盜集團鄭芝龍、鄭成功的家族。鄭一見張保仔聰慧，委之為小頭目。後來鄭一去世，他的海盜邦由他妻子鄭一嫂繼承，而鄭一嫂又與張保仔有染。正因為這個關係，張保仔搖身變為新的領袖。他號令嚴明，不許部眾搶掠鄉民，被清廷招降並當官後，更正式娶鄭一嫂為妻，可謂有情有義。張保仔傳奇是一個受害者變為大英雄的故事，象徵了社會不公義與貧窮的強烈抗議。葉靈鳳沒有把他刻劃成要改造世界的政治人物。張保仔只是個在既有世界裡試圖改善自己生活的普通人，這一點更令香港人喜愛這個人物。在張保仔的故事敘述，女海盜亦扮演重要角色，增強了性別自由與平等的價值觀，對那個年代男尊女卑的社會，也帶來了顛覆性的意義。張保仔的故事彷彿解釋了香港的身世，而敘述裡的海盜邦結構，猶如香港社會的縮影。

二、地方故事與海洋想像

由於正史沒有講述張保仔的事蹟，葉靈鳳只能大量依靠地方志來搜集資料而寫作，他亦因此打開了有別於國家論述的地方故事敘述。1938年來港定居的葉靈鳳，被歸類為「南來作家」，但他卻是少數真正對香港這個「化外地方」有濃厚興趣的南來知識分子。他大量寫過關於香港種種歷史的方物

1 最新的研究認為張保仔的基地，根本全不在香港水域範圍內，請參見蕭國健(1992)。

誌，後來編輯為三本著作《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錄》和《香島滄桑錄》，合稱「葉靈鳳香港史系列」，過世後於80年代出版。作為愛國知識分子，葉靈鳳寫香港方物誌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分裂國土、追求獨立，但他選擇定居在這個殖民地，而不去臺灣，也不留在大陸，多少可以透過香港的地方志暗示了他對家國的（有別於典型國家主義的）另一種觀點與情懷。

海盜邦特有的身分與社群，令他們變成不少人眼裡的傳奇英雄人物，更吸引著為逃避國家戰亂而跑到香港的難民一代。若瑟·麥基(Joseph MacKay)形容「海盜邦懂得掌控自己的自主權，以他們的武力在適當時機售賣予朝廷，又或以此向官府施壓」(2013: 552)。這種左右逢源以取得自主權的求生狀態，更輕易被香港的敘述吸納，投射為在中西之間擔任買辦的殖民地故事。在冷戰時代的封鎖政策下，海盜的故事敘述也象徵了華人想像的流動與自由，即使共產中國被美國及其盟友全面圍堵，亞洲水域其實是美利加帝國的領地，香港的海盜故事卻表達了廣闊海洋的無邊自由的願望。或許，海盜的神出鬼沒傳奇也反射了香港人對英國殖民管治的一種精神上的反抗，儘管他們現實地選擇在殖民制度下生活。

中國又稱海盜為海賊、海匪；中韓兩國更將日本的海盜與走私客貶稱「倭寇」。然而十六世紀的「和寇」（日文：わこう）其實大部分是華人，並非日本人(Anthony 2010: 7)。這些中國海盜被官府捕獲時，都捏造自己的身分為日本人，目的是不想連累家人，而政府亦不介意將海盜歸類貶斥為中國素來輕視的日本人。傳統道德觀念與正史裡被排斥的海盜，卻在香港人的心裡占據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位置。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傾向將香港與殖民者合作的華人視為叛徒或漢奸，而最初協助英國殖民者在香港進行建設的，多是傳統被歧視的「蜆族」（又稱蜆家人）。這些在中國傳統社會飽受歧視、不許參與科舉考試、不准在陸上安居的水上一族，可能的出路似乎就是投向殖民者(Carroll 1999: 17)。海盜故事敘述或許難以為香港在民族主義者眼中的殖民地罪業洗刷掩飾，但卻可以使之模糊曖昧化。

古代國家建設仰賴不流動的農業生產和定點居住的農村人口，這可以解釋傳統的國家論述與文明制度都表揚農業社會而貶低游牧民族，更視之為漢文明禮教與蠻夷的最大分野。定居的農村人口較容易被管治，亦是政府主要稅收的對象。與西方的殖民勢力相類似，中國政府同樣將對海盜的征剿視為文明與野蠻之戰，不過殲滅海盜絕不僅僅是文明使命，同時亦為主權國家開拓海路與擴展海外殖民的力量。國家主權或國族身分，本來就是國家機器強加於人民身上的東西。雖然現代的民族國家更有能力管治不同地域，但在國界邊緣還

是遇上棘手問題。地理阻隔或邊塞地區始終對國家行使主權治權有一定的影響，即使現代國家的壟斷性權力已經令非國家管治的空間變得愈來愈罕有。

關於海盜與走私的故事敘述，試圖脫離以陸地為中心的歷史書寫框架，將過往受邊緣化的海洋變為中央舞台，透過海洋穿越國界，把中國、日本、東南亞的歷史串連起來，整個區域由海洋聯繫，不能再單以個別的國家利益作為觀照視點。海洋成了超越大陸文明的無管束自由領域，既是跨國的空間，又混合著多民族的互動關係，打破單一國家民族的界線限制。

1997年正當香港主權要交還中國時，這種無邊際的海洋想像被香港一群藝術工作者重新挪用。一個名為《香港史前博物館》的展覽在九七回歸期間安排在香港藝術中心展出，以一個虛構的香港歷史，反擊主流的香港歷史敘述（包括英國殖民政府角度與中國國家民族觀點的香港史）。這個《香港史前博物館》展覽試圖塑造一個神話，以影射所有歷史書寫的虛假性，描述香港人來自海洋，祖先是半人半魚的「盧亭」。而盧亭可能是指古代一直被歧視、在香港以捕魚為生的水上蟹家人。香港藝術家以這個概念創作了似是而非的考古遺物，模仿官方口吻作出所謂歷史陳述與證據展出(Clark 2001: 63-66)。這次展覽的策畫人何慶基解釋：「把零碎的歷史資料和近期搜集的本地神話編成一段歷史，目的不是要發揮想像力，而是要說明，香港也有自己的文化。例如，我們說祖先是經海路來，而非陸路，以否定香港與大陸之間的文化聯繫」（何慶基 1999：56）。

與50年代以來的海盜故事最不相同的是，盧亭的神話敘述並不能引起香港大眾的興趣，難以產生迴響，反而容易被環球資本主義的跨海洋論述吞沒，失去了原來想建構的本地身分與聲音。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國力往海洋伸展，與其他國家的海洋主權競逐亦迅速增多。海洋已慢慢被國家控制，難以再在大眾想像中成為自由的廣闊空間。

三、農地敘述與對土地使用的反思

面對不斷壯大的中國主權國勢力，香港似乎出現了另一種剛開始的故事敘述。我姑且稱之為「農地敘述」，但它也不僅是關於農田耕作的，其實它與整體的香港土地使用都有連繫。香港是個彈丸之地，土地可算是最珍貴的資源。當海洋的可能性空間某程度上被關閉，剩下來的就只有這一小片土地了。

農地敘述不一定是現代的他者、或是現代化的對立面。抗衡中國政府的霸權，香港這個開端不久的故事敘述，可以被視為一種本地充權、試圖重建社群的欲望。一定程度上，農地作為一個另類想像，是希望保存著香港的自主——不是主權——地位。即使這種敘述鼓吹復興農業，但並不等於它是傳統的東西。為了對抗中央的管治控制，農地敘述嵌入了不少當下世界的流行理念，例如生態運動、有機耕作、食物自主與安全、環保意識、文化保育等等。

這個敘述在香港的誕生，最初可能源自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事件²，再在反高鐵運動³中發展，於保衛菜園村運動⁴後變得更具體成形。文化保育論述在香港的始作俑者，其實是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提倡文化保育目的是想重新肯定香港與中國的共同文化根源，加強香港對中國的認同，亦企圖淡化英國在香港的歷史地位(Carroll 2005)。反諷的是，民間團體或個別人士反而用文化保育，來對抗政府與統治階級，反對他們所代表的發展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極度剝削。

保衛菜園村事件，源於反對興建廣州—深圳—香港高速鐵路的香港段。該村位於設計中的列車停車側線，故必須被遷拆。當菜園村以外的城市居民加入保衛菜園村的行列，抗爭很快發展成社會運動，不單只為村民重建社區，還因而在以經濟利益為重的香港，提倡不同的生活價值觀。菜園村運動把城鄉距離拉近，儘管香港數十年來的城市發展似乎早已令城鄉的界線十分模糊。參與

-
- 2 香港特區政府進行中區填海工程，計畫將殖民時代甚具象徵意義的皇后碼頭拆除，作為擴展道路和商廈用途。此舉引起香港一些民間團體不滿，認為是摧毀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本土保育組織策畫了一連串論壇、靜坐和絕食，阻止皇后碼頭拆除，事件後來演變成警民衝突。
 - 3 為加速香港與中國的經濟融合與發展，2009年香港政府開始進行廣州—深圳—香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計畫，在財政支出、回收土地，以及車站選址、設計等問題上，引起了很大爭議。高鐵香港段被部分人批評為草率上馬、缺乏周章計畫，工程與鐵路及公路路線重疊、破壞居民的生活環境、製造空氣及噪音污染、高鐵造價極不合成本效益，只是為大型建築公司提供利潤。而部分政黨亦強烈反對興建高鐵，於審議政府申請撥款時，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利用不同的方式令表決時間多次延後。不少反對者（尤其是年輕一代）透過facebook、討論區、網誌等方式表達對政府高鐵方案的不滿，更於2010年1月審議高鐵撥款當天包圍了立法會，與警方發生衝突。
 - 4 香港特區政府及港鐵公司為建造廣深港高速鐵路，準備清拆石崗菜園村，以在當地興建列車停車側線及緊急救援站。當地村民與政府因為清拆村落問題而發生爭議。村民在過去四十多年間，在當地從事養豬、種菜等農業維生，菜園村因而得名，但大部分村民並非原居民。事件引來村民與香港保育人士的反響，自2008年11月起進行抗爭運動。該村很多村民在該地居住了數十年，希望維持新界既有的生活模式，並指責工程設計沒有考慮到當地村民，因而拒絕遷出。村民以「不遷不拆」為基本要求，開展了一系列的抗議活動。2011年政府開始強行收地行動，使衝突事件陸續發生。事件擾攘一段時間後，政府容許菜園村覓地重置。

菜園村運動的多來自城市的社運積極分子、不同的菁英界，如藝術工作者、傳媒人、法律界人士、學者、專業人士等，他們投入運動，大大左右著抗爭的結果。事實上，這個農地敘述主要都由這些城市知識分子製作、發展、推廣，即使他們大部分也未曾經歷過農民日常的生存困難問題（不過後來有部分知識分子真的參與了耕種行業，如2010年成立的「馬寶寶社區農場」以實踐永續農業為基礎，定期舉辦農墟、導賞團、工作坊及耕種班，推廣本土農業及自主生活，開拓城鄉共生的永續發展。曾是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副總編輯的袁易天，是馬寶寶社區農場的設計師、成員及導師，在上水馬屎埔村居住，指導過不少城市人耕作，眾人都稱他為「師父」。由馬寶寶社區農場開始，陸續有不同團體推廣永續農業，如「生活館」、「生活書院」等導賞及教育有機耕種；「土地正義聯盟」招募全職農夫，開拓鄉郊社區生活；「港嘢」推廣本地農村出產的食物等等）。敘述的抗爭語調，不等於它認同傳統的農民反抗運動。傳統的新界原居民，在這個敘述裡，反而較負面地被標籤為「地主土豪」。這些「土豪」透過賣地賺取厚利，或租地予外人作商業用途。農地敘述不太同情這些新界原居民，如何在英國殖民管治的法例下慢慢改變了他們與土地關係的歷史現實⁵。這些新界土地很多都不再用來耕種，即使擁有業權的原居民，有時也會租地給非原居民進行農業活動。換言之，農地敘述是以非原居民，或以任何對耕種有興趣的人的角度出發，即那些與土地沒有固有關係的人。這也造就了一種新的本土主義，而農地敘述亦代表了不同的價值觀，藉以對抗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國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市場政策的力量。

面對本地農產物只占市場的一至二個百分比的事實，這個敘述卻鼓吹復興農業生產，並細說本地農業的歷史故事：二次大戰後，大量難民從內地湧入香港，但不是所有人都在市區工作，其中有部分人住在郊區，當上了農夫。在這個敘述裡，港英殖民政府對本地農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冷戰的氛圍下，港英政府不希望香港的食物完全依賴中共的供應，鼓勵農耕亦可以舒緩市區的就業與房屋問題。這個敘述說70年代期間，本地蔬菜供應了香港六至七成的需求（周思中 2014：46）。農地敘述追求的，就是要回歸到一定程度的食物自給自足，重建本地食物供應的自主性，這也意味著減少對中國及其他入口地方的依賴。

不一定就等同分離主義者的獨立訴求，農地敘述堅持它的本土視野，有時甚至有點偏狹，未有太大企圖要與國家或區內的農民政治連結。不過，為

5 關於這段新界土地史，請參見Chun (2000)。

了爭取特區政府支持復興農業，這個敘述會引用中國不少城市為例，指出內地許多城市爲了安全考慮，都有維持一定程度食物自給自足的政策。農地敘述以一個基本要求作開始：爲本地社會穩定地提供健康又價錢合理的食物。要抵禦環球食物價格暴漲、不公平的貿易政策、環境污染、自然災害及食物安全問題，這個敘述以爲，只有本地農產品充足穩定地供應，才是最佳的解決辦法。同時，農地敘述希望公眾參與討論土地的意義，驅使施政者重新思考香港的土地應用問題。

農民在中國以至全世界都是最備受壓逼的象徵。農民似乎早已在香港消失，借用農民的角度來說故事（香港的農地敘述多用「農夫」一詞）及表達相關的生活價值，看來像個憑空的神話，可能比海盜故事更荒誕。不過，即使香港的現代化過程已差不多令農夫這個職業滅絕，但食物與土地等相關問題卻不會消失。中國再現代化、再城市化，農民政治依然是主要問題。香港的農地敘述似乎要拉著中國的後腿，特別是當中國正全速地現代化，而香港特區又要盡快融入國家的現代發展宏圖的格局裡。中國正大規模地將農村人口遷往城市，有系統地逐步減少農民的數目，香港的農地敘述卻要在已沒有農業的城市重塑農民的文化與身分，這多少都帶點叛逆反抗的意味。近年香港的「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由多個社運及環保團體結成聯盟的「土地正義聯盟」，除了在土地政策上與政府理性辯論周旋，主張保育環境及反對地產霸權，試圖爭取公眾阻止任何以規畫、發展及保育爲名的破壞鄉郊水土、農業的種種盲目土地施政外，有不少的激進派更正面衝擊政府機構，2014年6月百餘人衝入立法會大堂內，與保安發生推撞，導致多人受傷。

中國的農民問題源於極大的城鄉收入差距，政府的發展政策長期向城市、向沿海地區傾斜，令內陸農民的生活與社會地位，不能因現代化而合理地提升，讓農民的抗爭變得更頻密更激烈。土地問題不單是香港的嚴峻問題，在中國也是個極重要的問題。經濟發展仍然離不開土地、資本與人力這些基本的生產工具；經濟發展亦經常引起土地徵用、盜竊、腐敗及衝突等問題。毛澤東時代，土地改革與農民鬥爭是恆常規律，而香港的農地敘述表面上卻指向這些中國政府已放棄的政治手段。農地敘述攻擊土地私有化只爲了經濟發展的不正當性，要求政府干預土地用途以保障公眾利益。

農地敘述非常戲劇性地重塑了某種「人民起義」的形象：無權無勢的貧苦大眾對抗財雄勢大的統治菁英。然而，農地敘述的推動者其實並非來自邊

緣社群，他們亦有能力參與建制裡的政治。農地敘述裡的強弱階級兩極化可能有誤導成分，敘述的推動者其實是以政府渠道與主流價值，去游說有關當局及有權勢的人去支持他們的訴求。儘管他們會與某些權力機構起衝突，但這無阻他們用主流價值（如建設社區、鼓勵社會參與、綠色生活、食物安全等）去說服其他權力機構，爭取它們的支持。換言之，這是一種被認可的反抗，應用核准的途徑與原則，與有影響力者結盟，向統治階級施壓。

即使強調本土視角，香港的農地敘述實情也甚有國際觸覺，譬如它借用不少國際農民運動（如La Via Campesina農民之路）的語言與理念（包括全球化下的食物自主權、對抗大企業大財團的農業工業化、中央控制等），與反全球化運動、反新自由主義經濟互通聲氣，並應用生態學角度重申人與自然環境的反思。2005年，極有組織的南韓農民來香港，反對世界貿易組織高峰會議，期間他們以富有佛教意味的儀式進行抗議，並癱瘓了香港的交通，這都深深影響及啓迪了香港農地敘述的推動者。模仿南韓農民莊嚴的跪拜抗議儀式，香港的社運分子在參與保衛菜園村及其他街頭抗爭運動中，在一記一記的鼓聲之下，也是這樣三步一跪拜地進行他們的「苦行」，藉此喚醒社會，感動其他旁觀者。

無疑農地敘述把農夫生活與耕種理想化、道德化，以民主自治模式想像復興的農村作為另類的社會組織，帶有烏托邦的色彩，亦反映了這不是一個由下而上的草根故事。農地敘述，正如其他故事敘述，傾向把箇中人物單一化，不太理會他們的階級與性別的差異。當然這個敘述很有可能演化為一套較完整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它亦開始了民俗學的調查，試圖建立主體、農村社會與地區歷史⁶。當農地敘述質疑資本化的農業能否持續，它似乎亦有意與無意間忽略資本已在農村深深植根的事實。

當代世界已經愈來愈受國家政府的控制、管治。逃離的空間似乎愈變得不可能，尤其是政府的操控亦愈趨彈性、流動。我們的生活變得愈受官僚制度左右，所謂理性規條把我們囚禁在無形的鐵製牢籠裡。全面受管治的世界本來就是現代化的本質。非國家政府的敘述也許只是一種幻想，但它可以讓本已被遺忘抹掉的東西持續不息地若隱若現，靜待時機，造就某種看似不可能的改變。

6 可參見余在思(2013)。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何慶基。1999。〈創造歷史〉，收錄於《香港藝術概覽》(*Hong Kong Art Review*)，頁54-59。香港：AICA。
- 余在思主編。2013。《菜園留覆往來人》。香港：菜園村支援組及影行者有限公司。
- 周思中。2014。〈農的語意學：生活館的耕作實踐〉，《ACT藝術觀點》第五十七期，頁45-51。
- 葉林豐（葉靈鳳）。1971。《張保仔的傳說與真相》。香港：香港上海書局。
- 蕭國健。1992。《粵東名盜張保仔》。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二、外文書目

- Anthony, Robert J. ed. 2010. *Elusive Pirates, Pervasive Smugglers: Violence and Clandestine Trade in the Greater China Sea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arroll, John M. 2005. "Display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Museums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1(1): 76-103.
- . 1999. "Chinese Collaboration in the Making of British Hong Kong," in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edited by Tak-Wing Ngo, pp. 13-29.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Chun, Allen. 2000. *Unstructuring Chinese Society: The Fictions of Colonial Practice and the Changing Realities of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 Clark, David. 2001. *Hong Kong Art: Culture and Decolonization*.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 MacKay, Joseph. 2013. "Pirate Nations: Maritime Pirates as Escape Socie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7(4): 551-573.
- Scott, James C.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